

文化書評

《文社的盛衰——二零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個案研究》，王成勉著。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215頁。

這十餘年來，無論在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都冒起了一批有志從事中國教會歷史研究的學者，其中他們不少是專修歷史的，能用嚴謹的史學方法來整理及復原中國教會歷史面貌，王成勉博士便是其中一位。

王成勉，台灣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多年來從事中術國教會歷史的研究，並舉辦各項中國教會史研討會與有關講座等活動，帶動了學界與教會內的研究風氣。過去數年，他專注於文社的史料追蹤與研究工作，發表了數篇論文。如今他將這些文整理改訂，出版了《文社的盛衰》一書，收入《宇宙光創設廿週年紀念文集》中。

本書為對文社歷史唯一的全面研究。在篇幅不長的七章裡，分別討論了文社成立的歷史背景、成立的目標與經過、編輯政策、文字本色化的努力、本色化思想的研析、民族主義思潮，及其與傳教士的關係等課題。對這個在一九二四年成立，於一九三零年結束，即僅維持了六年的組織，作了相當全面的介紹。

作者將二零年代的非基運動，視為文社創立的時代背景，故以專章介紹了整個運動的經過。他指出：「在國家主義、變動思潮，與國民革命行動等因素所激發的反教風潮，讓教會與教徒們開始覺醒，思考如何因應這變動的時代。」(頁35)而文社的成立，正是因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現象。在結論中，作者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文社的出現就是在二零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衝擊下，基督教內一群少壯派的菁英對時代的反應。」(頁157)

在「文社之成立與發展」一章裡，作者清楚將中外領袖主張成立機構，推動本色文字工作這歷史淵源，追溯至一九一八年。而在一九二四年，即反教運動未臻高潮以前，文社正式宣告成立。如此說來，文社的創立就不是因為非基運動的啓發或刺激。事實上，文社在其創辦的月刊中，甚少直接回應時代對基督教的責難，只是鼓吹建立本色化文字工作及本色化教會。筆者有理由相信，與其說文社的設立是教會為了回應外來的攻擊（即教外人仕指責基督教為洋教之事），不如說是反映了教會內部一群新冒起的華人知識分子信徒對教會及教會文字事工由傳

教士把持的事實的不滿，因而希望另闢論壇發表他們的言論主張。換言之，所謂「民族主義」的衝擊，主要發生在教內，非教外。當然，二零年代是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年代，教會內的知識分子，自然也受教外泛濫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故事情發生於教外還是教內，當事人的心態也許並無太大的差異。不過，要是民族主義的浪潮直接來自教內，本色化要求也源自這群華人信徒；那麼，在檢視文社成立的時代背景時，就不能單單縷述社會的反教風潮（因這充其量只是背景的背景而已），更必須對二零年代教會的情況、傳教士與本地信徒的關係、教會資源的來源與分配，以及華人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興起等歷史資料進行分析，因為這些才是促成文社成立的直接因素。

可喜的是，本書第三章〈文社文字本色化的努力〉及第七章〈文社與傳教士〉裡，也提到了當時出版界受制於傳教士的概況，補充了第一章背景資料之正足。

交代了文社創立的經過，作者開始集中分析文社的文字工作，主要是就《文社月刊》的內容，觀察文社的編輯方針及所其在文字本色化一事上作出的努力。不過，所謂「本色化」也者，不外指若干學者在言論上對當時教會文字事業提出的批評，及一些口號式的建議，談不上甚麼正面的頭體建樹。尤其諷刺的是，文社批評廣學會的出版工作以翻譯外國著述為主，他們自己出版的十本書裡，竟有六本是翻譯作品。至於他們的「編輯政策」，簡單地說就是撇除一切對信仰立場的考慮，「開放」地接納並刊登所有來稿，包括以流行的革命思潮來附會基督精神、接納一切「進步」思想，以至用「神話理論」來詮釋基督信仰等，皆來者不拒。筆者在此必須指出：《文社月刊》的編輯們無疑在神學立場上遠較他們的批評者為「開放」，但這僅僅表示了他們在神學立場上缺乏原則，並不一定代表他們的個人性格或編輯政策「開放」，更不表示其他拒絕刊登這些文章的雜誌就是在編輯政策上「封閉」；畢竟，神學上的執著與堅持，與「開放」、「封閉」等態度並無邏輯上的必然關係。從文社的編輯方針，我們反倒看見自由主義神學如何在二十世紀初泛濫於某些鼓吹教會改革的知識分子群中。神學上的分歧，使保守的信徒拒絕參與或支持由一些被視為「新派」的機構或個人所推動的教會革新運動，導致教會內部壁壘分明，教人非常惋惜。

第五章討論文社的本色化思想。建立本色化神學無疑是文社成立的目標之一。但正如作者在〈結論〉中精闢地指出：何謂本色化、如何實踐本色化，文社的參與者根本沒有共識，甚至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有一個清晰的看法，很多時只提出口號式的方向，並且「多是含糊、籠統」的(頁159)。因此，這一章的分析便顯得略為尷尬。作者雖然羅列了《文社月刊》不同作者的本色化主張，卻不能將之視為同質的思想來綜合、分析，故未能整理出一套能歸入文社名正的本色化思想體系。綜觀全章，我們只能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文社的作者，大都主張建立本色化教會，僅此而已。(其他的所謂建議，如培養華人領袖，將信仰結合中國文

化上等，即放諸當代，亦僅常識罷了。)

第六章談論到〈文社與民族主義〉時，作者同樣得面對前一章出現的困難，即僅能在資料上告訴讀者，《文社月刊》的文稿中，其他人作了果些主張。至於這些主張是否創見、是否周全或負責任，暫毋庸議；其實，我們至少可以質疑它們在當時的教會中是起過任何的作用，或會否指引教會的路向。

對筆者來說，第七章是最有啓發性的。作者分析了文社與傳教士的關係，指出當時把持教會文字事業的，多為在神學立場上比較保守的傳教士，他們對言論激烈、思想「新派」（作者用語）的文社成員心存抗拒。只有那些「新派」的傳教士才支持文社的工作。再者，文社因為經濟支援中輟而結束(頁148)，也是由於保守派傳教士向素來在經濟上支援他們的美國「社會宗教研究社」告狀，指文社在中國傳布「異端」引致的。如此一來，更突出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二十世紀教會改革與保守二派之爭，許多時只是神學上的保守派與新派之爭。

綜觀全書，作者對這個成立只有數年的華人信徒組織作了頗為清晰的介紹，並對《文社月刊》的文章內容作了鳥瞰式的分類檢閱。在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教會歷史的論著仍寥寥可數的今日，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補充。筆者衷心認為這是可喜的成就。不過，若要對應本書副題所標示的「二零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個案研究」，則作者所提供的，仍只是未經過深入分析的史料，未能對二零年代中國教會的本色化運動，提供全面的、指導性的解說。

在恭賀本書成果的同時，筆者也期望王成勉博士能在這個基礎上，更深入地研究文社的成員的個人資料、社員間的互動關係，及他們在二零年代社會與教會脈絡中的角色與作用，為深入了解這個時期的本色化運動，描繪出一幅更整全、更清晰的圖畫。

最後尚須一提的是本書的史料應用：作者除參閱了文社所出版的《文社月刊》外，又翻閱了《真理周刊》、《生命月刊》、《真理與生命》、《中華基督教會年鑑》、*China Mission (Christian) Year Book*、*Chinese Recorder* 等主要中國教會史資料，及大量相關的原始與二手論著。尤其難得的是，他數次前往北美搜集史料，也查閱了幾套重要的文獻，包括美國「社會宗教研究社」的檔案、「青年會」檔案，在史料的開拓與整理上，功勞菲淺。

然而，單就本書的論述而言，上述史料用量不多，通過運用史料而作的較深入探討亦稍嫌不足，很多時僅在註釋中提及曾參閱了某種書或某項史料，並無進一步的申論。因此，無論在發現事實以至提出史論等方面，內文均與參考書目略不相稱。筆者相信，作者尚在充分整理及鑽研該批珍貴史料以後，可以為我們作出更深入而精闢的史學解說，筆者對此拭目以待。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